



马忠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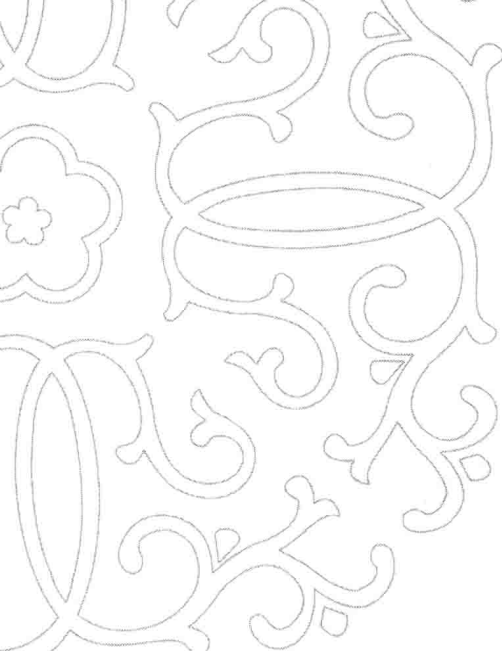
分化与整合

西北地区社会结构转型研究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A Study on Soc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in Northwest China



科学出版社



马思才◎著

分化与整合

西北地区社会结构转型研究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A Study on Soc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in Northwest China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分化与整合：西北地区社会结构转型研究/马忠才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4. 10

ISBN 978-7-03-042144-9

I. ①分… II. ①马… III. ①社会结构-研究-西北地区 IV. ①D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6367 号

责任编辑：朱丽娜 苏利德 曹 伟 / 责任校对：蒋 萍

责任印制：徐晓晨 / 整体设计：楠竹文化

编辑部电话：010-64033934

E-mail: fuyan@mail. sciencep. 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厚诚则铭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 年 11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4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6

字数：261 000

定价：6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序 一

我们的学科与“打通”之路，这样走来

一

30年前的1984年，原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创办了西北民族研究所，动机原本出自对“文化大革命”反思后的一个学科基本建设之举。所名还是当时国家民委领导人拟定的（原申报所名是“民族教育研究所”）。这个反思的主旨，是出自这样一种回顾与思考：新中国人民政权，一反千年封建王朝与国民党政府大民族主义的统治惯制，要实现各民族当家做主、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于是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专业人才成为一切首要。为此，民族高校应运而生。新中国第一所民族高校，便是西北民族学院。她的办学宗旨是强调族群性的，也突出了区域性。因此，“西北民族研究所”的关键词应是“西北”“（少数）民族”“研究”。

二

应该说，民族学院类型高校群的产生，确系中国教育史中最崭新灿烂的一页。然而，西北民族学院从成立伊始的1950年，直至1984年前，却未曾有过科学意义上成体系的民族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专

业建制、教学队伍与体系的组建（这与稍后 1951 年在首都北京创办中央民族学院的情形：有中国学界老一辈著名专家吴文藻等，以及早已成为领军人物的费孝通、林耀华等学术大师群体的存在有别）。虽然学科建设上的这种“空缺”、责任与损失并不都来自学院本身与其时奉命而办学者个人，它与当时中国大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学科等从旧中国高校转入新中国的境遇完全是一致的。随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贯彻执行，的确对有志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等的学人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所以说，1984 年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的创办及《西北民族研究》甫创问世，从高等教育着眼看问题，便是当时西北民族学院民族学人与少数民族高教工作者学术心愿的首次圆梦！

三

然而，发展道路又总是曲折的。“市场经济”转型，带来所谓的“全民下海”冲击，本是“意料中”的事实，而“单位”创收，导致高校其时某些捷足先登者从办班中捞取的第一桶金，诱惑本在坚守岗位的教师之力，却是令人“意料之外”！希冀重建人类学/民族学的敢想者中也出现了教学与科研比重的意见分歧、科研经费和基础建设等问题无从提上日程的迷茫，凡此直接涉及成员工作量、职称等切身利益的不平与困惑。自然，复杂的表层不能掩盖其简单的内因：历史转折关头老校如何“新生”，学校未来整体发展如何构架？对普通高校而言，民族学院型高校的不可替代性特点究竟何在？民族院校的时代性角色该怎样定位，哪些是实践实证了的真正的“拳头”专业？应恢复、重建哪些机构？又该急速补、缺、扩建哪些必有的学科？哪些专业由一般普通高校去办比民族高校会更有条件……实话实说，这些本为办学内行领导和热爱民族教育的教职员工所关心、关注的事项，因“文化大革命”后遗症的作祟而纠缠不前，以及其时“年年五月换领导”的不得已，也让大家一时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困境！

道路曲折不足为奇，关键是方向！路向何去？谁说了算？中国转型，在办学问题上，还要不要走群众路线？

四

经过彷徨、内外沟通，几经“阵痛”，终于在1998年10月，借全国教育界连续改革热潮启动和校方领导层的变化、理解与支持，原西北民族研究所的个别人，决定以放弃原基础资料设备和经过好几年头整合的学术队伍，以及已在全国学术圈子里开始产生影响的“西北民族研究所”的“品牌”名称、建制和大部分成员为“妥协”代价，三五青年学术同道加个别老先生，走出原西北民族研究所的大门，重新组合了“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系、所合一的机构，另起炉灶，重开人类学/民族学（民族志学）、民俗学的学科建设。

这个人类学、民俗学名称的出现，为“新中国第一所民族高校”办学近半个世纪后首次整合，填补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专业从未有过的科研与学科空白；也在西北民族学院首出“系所合一”的教学形式，把科研直接引入课堂教学。在大西北，人文社科学界第一次出现了人类学、民俗学的学科名称和建制雏形。不久，在费孝通先生的力荐下，又借教育部为北京大学批办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契机，我们与北京大学合作在西北重镇兰州举办了第六届高研班。

费孝通先生煞费苦心的目的有二：一为扶持西北民族大学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的开创；二为开发西北，做培养专业人才的酝酿。费孝通先生亲临我校为我系揭牌，并在会间主旨讲演；多次召开来自大西北各地青年的各类型座谈会，谈到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专业人才的重要性和迫切意义。他语重心长、深入浅出，这给有志的学科建设者们以极大的精神支持和学术“扶贫”。后来的事实证明：费孝通先生热心倡导的这次与北京大学合办的高研班，在大西北民族地区高校各民族青年教师中，播撒下了社会学、人类学知识

与学科的种子。

五

1990年我们曾首获民间文艺学（含民俗学）硕士学位授予权（马学良、宋蜀华、钟敬文等老一辈学者唯图学术的胸怀和勇气，成了真正“助人成功”的关键），1991年我们开始招收民俗学研究生。鉴于我们对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的历史脉络和多元现状及其特征的本土理解，在组织教学与科研上，确定了重视田野作业、开辟民俗志积累、坚持多民族地域多元文化特色、从头打好学术基础建设的发展思路。再加上人类学/民族学教学点的逐步开拓与社会学教学，我们打通了三门学科的交叉；冲破以往全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教学仅设在中文系（汉语系），并多作为讲座课（选修课）的传统惯例，以每位研究生入学，必经“始业课”的专业启蒙，作为来自不同专业本科生开始（民俗学、含民间文学）研究生教学的“学前补课”；同时，强调导师要根据研究生个人旨趣和优长（或民族性知识、或地域性知识、或专项民俗事象知识）为本，定其专业研究的具体方向，而不可仅仅依据导师“课题”之需确定研究生个人的发展方向。随着实践的延续，果然局面顿开。至2012年，这个教学点（含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民间文艺学两个研究方向）共招收了10多个民族的硕士研究生147名，已毕业获得学位者132人。在毕业生中近2/3成为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考博生源，他们分散于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南大学等多所名牌大学攻读、“进站”；至今，其中有的已成长为名校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从2004年开始，我们又开始招收攻读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学的博士生，至2012年已有12人获博士学位。这一集中现象是西北民族大学创办以来其他院系、专业所未曾有过的。更重要的是，在培养人、训练队伍的同时，我们积累了不少以

专业要求采集到的比较有质量的田野民俗志的新资料。尤其在其后以降，费孝通先生提出西部大开发中人文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开发的问题后，我们在承担“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民俗部分的任务中，坚持了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发挥地方性知识和民族语言无障碍的优势，以及深入生活第一线、零距离现场考察的专业训练学风。民俗学研究生教学实践，在历练了教学骨干的同时，区域民俗志资料成果累累结枝，积累了几百万字的民俗志数据库资料。

我们这个系（所）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艰苦奋斗，借助全国形势好转带来的时运，进一步发展为“社会人类学·民俗学学院”。我们使民俗学的整体学科建设、发展路子，摆脱往昔传统上仅从“文学”上先入为主地唯以“民间文学”带动民俗学的旧教学轨道，借鉴相近学科人类学（民族志）、社会学（宽广的视野与方法）、民间文艺学的优势，既互相交叉渗透、互促发展，又各自保持相对学科独立发展的轨迹。我们用超强的劳作先后开办出游牧、农耕、人口较少民族等民俗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类型；族群、信仰、文化、家庭、妇女、影视、民间艺术（美术、工艺、歌谣、戏曲、舞蹈）等专业方向，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 student 学养的丰厚、“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的整体性大视野提供空间，以适应转型期人才市场的多样需求。目前，我们除已有的民俗学研究生点外，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工作和民间文艺学等的硕、博研究生都在培养之中。

六

近五年来，我们相继开设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的相关先进专业，在开闢局面中崎岖前进。我们的民俗田野，除涉及西北各民族地区外，也借主题的需求而波及内蒙古、西藏、新疆、四川乃至华中、华东，甚至东北各地及海外。在物质条件极不富足的状态下，坚持依靠业内同行办好我们的专业学刊《西北民族研究》，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同，成为 CSSCI 刊物，也成为这三个

学科硕、博生和专业教师们喜爱的一块绿色学术平台。目前,《西北民族研究》已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我们正努力把促进、服务于教学、科研和社会的学刊,办成“文化走出去”“丝绸之路经济带”服务的学术品牌。

我们的学科基础建设和教学实践使我们体会到:虽无法回避出于目前还存在于体制上、机制上的掣肘和终与常规仍存距离的艰辛事实,但各高校圈内同行认可的这个路子,亦可视为一种有益的中国地方学术实践经验。事实上,在我们之后,也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界大师级老一代代表人物费孝通、马学良、钟敬文等谢世之后,我们看到从北京师范大学到内蒙古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也都先后改制或创办了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模式的教学建构……我们自己是欣然的。

七

高校在一阵扩招、扩办、并校、升级之后,据说出于“冷思考”的调整把高校分类为“研究型”“教学型”等几种发展类型,以及部属、教育部外部委属和省属高校;又似乎学校一旦被划进某种类型后,即将在某类型框子内以行政“规范”去管理(如何有竞争)。各校内各学科、专业之间大约已有的发展水平不尽相同,是将随所属学校类型“一刀切”而去存在、发展?还是以所属行业学科实际水平去“强强联合”(如同当年之“院系调整”)、去整合?还是随其各校自主“挖墙”“流动”“自生自灭”,以示“市场经济”在教育上的反映?抑或已有资源自主存留等市场经济范式……在如今高校领导层似皆为教育内行,大都系博士、教授的现状下,自主趋势如何发展大学,仅为普通身份的专业教授在学科建设、发展中能发挥多大作用?目前难以预测。虽说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关乎群体、社会、国家认同与人类的大范围,但似乎此类学术属性在中国,往往不像办体育、办艺术那样红火而幸运;确是一种不大显露政绩的“孤独性”学

问、学科，得到在意“政绩”“指标”的领导的眷顾，常常是不易的。

好在我们曾经的努力皆属于真实，亦曾经被其时业内所认同过；“助人成功”之说，本为各自所指各有个人的理解、界定和认可。无论如何，师生风餐露宿的“田野”是为学执着的“书呆子们”汗水的播种。于是，仅仅出于其时一个教师的我们，本着曾经为师之心、师生同窗切磋，或曰“教学相长”之情，将把部分学子为攻读学位而参与的调查报告，做初步学术规范和可读性的整理后，以一种资源回报给社会群体，也为这世变方激的新世纪之际，师生们从前沿生活大潮中舀出的这一瓢瓢底层的浪花，存留给来者而感到努力过的欣慰！我们自认为这一行动对当前学术浮躁尚不能一个早晨就烟消云散的今天，于师、于生、于己、于众、更于学校之心，当年大师之良苦用心，皆属心同此理吧！

八

若有幸，甚而尚存继续从业之机，我们随时准备用被边缘化了的文化行为寻求可认同的学术合作伙伴。

我们的“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考察报告”系列的编辑，虽也曾得到学界不少贤达的鼓励、促成，但终因未能直接挤入本土的“工程”类和“扶持”类，不足的经费导致了它无法“满书尽披黄金甲”的华贵包装及名人作序牵銜，只能是“素面朝天”，以真人真事的朴实面孔迎接她的识者——广大学子读者了。

本系列之一，曾应方李莉女士建议配合中国艺术研究院“基础数据库”重大项目中民俗部分采集，归入另一丛书出版；本系列之二、三、四共三集经本校现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文化（苏依拉）教授之力得到本校资助在兰州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之后，系列之五、六、七、八共四集由郝苏民得到祁庆富教授支持纳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丛书”出版。到此，这一系列共八本书，是分别由三处支持才问世的。但是从

西北民族大学初创“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系到培养出自己的硕、博研究生和他们的成果，我们实在是得到了不少贤达和学界志士仁人在关键时刻的真诚爱护、支持和帮助才有些许作为的。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又逢“国学”重新被大大提倡，教育新时代青年一辈也要知恩图报，不可满城尽当“白眼狼”之际，我作为这个系列各集成果出版的操办和见证人，深深体味到了出版学术书籍的不易，不能不郑重提到下列先生和同学，因他们的关爱、辛劳，作为其时导师今日主编的我，以及各集的撰稿人在此一一向他们致以中华民族传统式的抱拳和鞠躬：真诚地谢谢你们了！除已经鸣谢之外，他们有费孝通、马学良、宋蜀华、祁庆富、马麒麟、谢玉杰、马戎、杨圣敏、王铭铭、刘锡诚、刘铁梁、董晓萍、金雅声、何烨、文化、沙平、马国柱等诸位先生、女士！

本系列之五、六、七、八共四集出版后，据出版社回应，意料之外地收到良好的市场效应。那么，又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社会上还有人自愿阅读，任何凭空之话已无意义；就顺乎读者与学科的“民意”继续办下来了！于是，我们终于以“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省民俗学建设基地之资格和所获基金的支持，继续我们系列的延续，这是本系列第三批成果的出版，是继第九集之后的延伸。

我们还可欣慰地告诉民族民间文化爱好者的是，我们的坚持不仅仅表现在硕士水平的田野成果的数量上；博士生的田野成果，也将与此同时以“西北民族大学民族民间文化博士论文系列”同步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我们相信这应该是一个质量上的努力。

马忠才副教授，受泽费孝通先生建议从数学专业转学人文学科，先学民俗学获硕士学位；继而进修北大有年，进而考取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受业于马戎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后回校执教。文理兼通的他，前后接受北京大学 5 年的学术熏陶、实践，品学兼优，晚近来已有撰述、编写发表于各大核心学刊，这本《分化与整合：西北地区社

会结构转型研究》即为西北地区文化研究系列专著之又一系列之一。可以看出，作者规范的社会学视野和方法论指引下的专题研究，在广泛吸纳各大家观点、成果的基础上微观考量，不无涉及在个案中的人类学和民俗事象涵盖下的人文关照和“接地气”的用心（从表象上的利益分化、冲突到观念的嬗变；潮流上的现代化、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冲击）。对我们的启示之一是，“学院派”学术背景、学风养成，真正非形式上的学科交叉，于人才培养，于专题研究和教学，都应该是值得关注的议题之一。

A. 速莱蛮·郝苏民

2005年12月岁末于金城沙痕书屋

2007年元月修订

2013年7月9日病后再修订于酷暑中

2014年7月9日写定于愚谈“一个梦”之后



序 二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是社会学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核心概念,也是重要的研究专题和分析视角,而“族群分层与流动”则是社会学研究一个多族群国家内部群体关系的核心概念,研究的是各群体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相对地位,以及各群体在社会流动机制中的渠道和机会概率,换言之,就是调查与分析各族群在社会结构中是否出现“群体性倾斜”的现象,分析各族群成员在争取个人向上流动时是否可获得大致相同的机会。

在一个主张并争取实现种族/族群平等的国家,当社会学家发现某族群处于“群体性劣势”的状态,其成员的上升渠道遇到制度性障碍并导致族群分层结构发展态势趋于恶化时,那么,学者们就需要根据现实社会中的具体问题提出必要的政策调整建议,在制度上创造能够帮助“弱势群体”成员排除障碍的新机制。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针对美国社会中存在严重的学校种族隔离现象,美国学者提出了通过行政和财政手段废除公立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主张和具体实施措施,同时针对少数族裔在著名高校招生中录取比例过低的现象,学者们又联合各界进步人士推动了《肯定性行动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或译《平权法案》)在联邦议会的通过,使美国著名大学(如8所常春藤名校)本科招生中的黑人比例接近黑人在人口中的比例,从

而逐渐培养出黑人中产阶级和一批活跃在各领域的杰出黑人精英，改善了美国的“族群分层”结构和增加了优秀黑人青年的流动机会。由此可见，“族群分层与流动”研究在认识多族群社会中族群关系的现状和存在问题，以及提出改进思路与具体措施方面，确实非常重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学家也开始关注中国的“族群分层与流动”这一研究领域，并努力借鉴国外的研究思路和经典案例，相关的研究成果包括了人口普查各民族受教育结构、劳动力行业与职业结构数据的比较分析，也包括了在不同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的专题实证调查（城乡居住格局、族际通婚、语言使用、双语教育、族际社交网络、人口流动、大学生就业、贫困问题等）。尽管在这个领域及相关专题方面发表的研究成果数量还不多，但表明中国的“族群分层与流动”研究已经起步，而且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族群分层与流动”这个社会学核心概念是美国学者首先提出的，这个领域的大多数经典研究（特别是量化分析）的对象是美国和加拿大的数据与案例，这与美国种族矛盾比较突出这个历史背景，以及美国应用社会学研究比较发达、社会调查数据比较丰富有密切联系，中国学者可以从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借鉴许多东西。但是我最近一直在想，中国学者注意吸收美国族群分层研究的学术积累无疑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美国社会的种族/族群关系毕竟与中国社会的族群关系（包括历史与现状）存在重大差异，中国学者在思考中国的族群分层问题并开展实证研究时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我们在阅读和借鉴美国研究成果时需要注意避免出现“路径依赖”，不能完全跟着西方学者的足迹走。

美国是一个由移民建国并以欧洲白人移民及其后裔为人口主体的国家。今天北美土著印第安人的人口规模很小并聚居在西部偏远贫瘠的“保留地”，印第安人在历史上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文字，尽管有些部落语言由于语法特殊受到语言学家的重视，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美军特定的“密码”，但是印第安人并不拥有可与白人主流

文化相抗争的语言体系、宗教体系和文化传统，目前已通用英语，在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均处于十分边缘的地位，对美国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正是由于印第安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边缘地位，印第安人研究长期以来在美国族群问题研究中一直十分边缘，没有受到主流社会的重视。

美国黑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自16世纪开始的奴隶贸易使大约上千万的黑人被贩卖到美洲，黑人是构成美国人口和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北战争后黑人摆脱了奴隶身份并开始向北部和西部迁移。2010年黑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2.6%，而且99%居住在城镇，黑人在许多城市中（包括首都华盛顿）已占总人口的半数以上。人口规模和城市化使得黑人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都与黑人问题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的黑人运动几乎撕裂了美国社会。所以，美国学者的种族/族群研究对象长期以来集中在白人-黑人关系上，相关的族群分层与流动研究也大多以黑人团体为对象。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经过了几百年与白人的共处并曾长期处在从属的奴隶地位，美国黑人的语言（英语）和宗教信仰（新教、天主教）已经与白人主流社会趋于一致。换言之，黑人奴隶与白人奴隶主之间存在深刻的阶级矛盾和种族偏见，但是不存在明显的语言隔阂与宗教冲突，即不存在文化区隔。因此，只要把美国宪法的“人人生而平等”的精神真正落实到黑人公民身上，为黑人青少年提供良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通过几代人的社会流动，就可能出现种族关系的改善和传统矛盾的化解，马丁·路德·金博士的“黑人梦”就可以实现。

中国的几个重要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的情况与美国少数民族的情况相比有几个重要的不同之处。

第一，这些群体虽然在历史上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地域迁移，但迁移的范围仍是在东亚大陆这片土地上，近几百年他们作为本地居民已经在现居住地扎下根来。这与美国各移民群体（如白人、黑人、亚

裔、拉丁美洲裔)跨越大洋、洲际迁移的历史不同。

第二,这些族群在历史上各自发展出自己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尽管他们的宗教信仰(佛教、伊斯兰教)的源头来自境外,但是在几百年的发展进程中已经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灿烂文明体系。中国主要少数民族的文化积累和传统文化体系与北美土著印第安人的文化积累不可同日而语,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来看,这些文明并不逊色于中国东部汉人创造的中原文明。按照顾颉刚(1996)先生的说法,中国存在西部的“藏文化集团”“(穆斯林)回文化集团”和中原地区的“汉文化集团”。尽管这些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已有许多世纪的交流与互相渗透,但是彼此之间依然存在明显差异。这与美国黑人与白人在文化上(语言、宗教)具有较高同质性的情况全然不同。

第三,中国的这些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大(如维吾尔族人口已过千万),并高度聚居在政府为这些族群建立的自治区,这些自治区占中国陆地面积的64%,在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发展、文化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与仅占美国领土面积2.4%的土著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情况无法相比。

第四,这些族群的语言(维吾尔语、藏语、蒙古语)是本族聚居区的主要交流工具,本族的传统宗教信仰(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生活习俗(饮食禁忌、婚俗葬俗等)是当地文化生活的基调。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几个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地族群与汉族人口之间存在着界限清晰、色彩鲜明的文化区隔。

从以上四个方面来看,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场景中研究族群关系,需要关注“族群分层和流动”等社会层面的相关变量和问题。还有一个重要方面,由于中国各族聚居区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区隔,于是使用哪种语言文字作为学校教学语言便成为一个重要和敏感的议题,它既涉及当地族群的文化自信、尊严和文化遗产,也涉及全国性就业市场对于工具性语言(汉语普通话)的选择性倾向。而这个“族群文化

区隔”在美国传统的白人-黑人关系研究中是被忽略的。我们也会读到美国学者对于族群语言、宗教差异的实证性调查文献，但是这些研究的对象偏重于新移民（如来自亚洲的华裔、越南裔或来自拉丁美洲的墨西哥裔、古巴裔），美国推行的“双语教育”实际上是引导新移民从母语过渡到英语。所以，我们对国内族群的研究可以借鉴美国白人-黑人关系研究的成果，研究的主题关注族群分层，在指标体系上关注教育程度、行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族群比较，但不可忽略中国国情中的“族群文化区隔”这个重要的社会现实。

以上是我思考中国族群分层研究时想到的一个问题，希望年轻学者们在今后给予关注。从整体来看，目前国内的族群分层研究仍然非常薄弱。2012年马忠才在北京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新疆的族群分层：结构与机制》，这是对西部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的系统量化分析，论文计划列入“21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作为专著出版。所以在利用调查数据进行族群分层研究方面，马忠才已经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经验。他即将出版的这本《分化与整合：西北地区社会结构转型研究》是他新近完成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基于西北人文土壤，对社会结构转型进行探究，可以看作是他博士论文研究的延续，研究的地域从新疆拓展到西北地区，研究视角从族群分层扩展到民族地区的社会分层、利益分化、观念分化与嬗变、社会失范等诸多转型问题，这可以被看作我国族群分层与流动研究的一个新进展。我很高兴为他的这本新书写个简短的序言，同时也期待他在这个领域中继续耕耘，并把中国的“族群分层与流动”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马 戎

2014年7月1日于北京大学

蓝旗营